

(论) (经) (济) (增) (长) (质) (量)

——9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

朱启财 罗剑梅

国民经济的增长关系可由两方面内涵给予体现，一是国民经济综合体中生产资源和产品数量扩张的经济增长速度，二是产品优化和经济效率提高的经济增长质量。以结构优化为主流的现代经济增长，其实质就是在一定的速度约束下通过提高经济实体的效率和质量来实现经济的有效发展，这也是我国90年代经济振兴的战略选择。

一、我国经济增长走质量型轨道的客观必然性

经济增长作为一定社会经济活动的结果，是衡量一国经济进步程度的最重要标志。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标志的考察主要甚至唯一地以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国民经济中投入与产出数量的绝对值变化关系来反映。这使得我国现实经济运行一直表现出过热常态的特征。诚然，在经济建设初期和粗放经营阶段，利用增长的高速度来迅速奠定工业化的物质基础和满足人民基本需要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是我们已经过40多年的建设而进入90年代，社会经济已具有了相当规模，经济体制及其内部关系都已发生了较大变化，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我国经济从总量增长转向结构增长，实现经济发展由速度型向质量型轨道的转换，这是现实经济运行关系的必然结果。

(一) 社会生产目的决定经济增长的轨道选择。经济增长目的及其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社会经济关系，是由整个社会经济关系本质体系所决定的，主要是由社会所有制性质及其产生的社会生产目的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就是要以最优质量产品，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要将社会经济效益不断转化为扩大再生产的物质能量，保证社会经济发展。这就要求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必须是选择一个在“适度增长率”的条件下，通过经济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来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有实绩的发展。

(二) 现实经济关系使速度型发展轨道受到约束。通过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来实现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最常见的经济扩大再生产模式。这种模式在我国主要是通过工农业总产值(C+V+M)的增长率来反映和体现的，总产值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扩大都引起总产值的总量增长。这样，速度型增长的数量变化关系可呈下列三种情形：① $\Delta(C+V) > \Delta W$ ；② $\Delta(C+V) = \Delta W$ ；③ $\Delta(C+V) < \Delta W$ 。其中 $\Delta(C+V)$ 代表新增投入， ΔW 代表新增产出。由此可见，①②种情形的数量变化在于新增投入大于或等于新增产出引起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提高，但并没增加社会财富，相反却使财富造成损失和浪费。只有第③种状况才表明速度的加快使社会财富的实际增加，从而真正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实绩水平。无法否认，上述几种情形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会呈现相互交错和并存的状况；但同样我们要看到，主要依靠速度加快来使经济增长的路子在现实经济中已受到不可回避的约束。

1. 产业部门间发展速度的非均衡性约束。这主要表现在工农业增长关系的差异性和基础产业支撑力的有限性方面。众所周知,由于农业特殊生产方式及其内部关系,在不考虑自然灾害的影响下,农业的发展速度一般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征,据中外有关数据统计,其增长率大致平均为3~4%。这样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很大部分取决于工业的发展速度,而国民经济总体中工农业之间的制衡关系,客观上要求工业发展也要具有相应的稳定性和适度性。根据《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预测,我国90年代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为6%左右。在农业只能以3~4%的增长水平下,工业发展就要平均达到8~9%的增长速度,这在同期的世界范围也是较高的,那种认为90年代的6%的增长率偏低和很容易达到的观点是没有分析工农业增长关系的差异性。因此,农业的低匀速增长客观上决定了工业发展速度的相对稳定性,也制约了工业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目前的能源、交通、通讯、教育等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的支撑力很有限,这些产业由于资金、技术等条件限制在今后几年或十几年中还不能迅速改观。这样,基础产业有限的支撑能力使我国90年代的经济无法继续走高速度的轨道。

2. 市场吸纳能力与需求结构的非对称性约束。人们一般认为,“短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增长不受市场约束。但是,1989年底出现并持续至今的我国市场的滞销及疲软状态已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商品经济关系下的经济增长,不仅受供给及其条件的约束,而且受市场需求的约束,并且后者的约束度较高、约束期较长、破坏性也较大。因此,在市场吸纳与需求结构不对称条件下,经济的高速增长只能表现为社会库存积压的增加。可见,社会有效需求及其实现状况,市场与需求结构的对称关系,是商品经济下影响经济高速增长的另一重要因素。尽管90年代我国的有效需求总量不低,但有效需求的实现关系与80年代及其以前相比会有较大变化。特别是90年代,人们的理性预期水平增强,判别商品的消费效果的能力也提高了,这就使得经济的增长不得不考虑人们的需求成熟程度及其形成的需求结构的变化。

3. 资源成本的上升性约束。速度型增长总是以较大的资源成本投入为前提的,有时甚至构成经济增长总量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90年代我国经济中的资源投入不仅受到总量上有效供给不足的限制,而且具体的资源使用成本也会越来越高。一方面,能源、矿产等开掘的成本上升,要求也更高;另一方面,随着计划体制的改革,资源使用基本上要进入市场,在各地拥有的资源条件不等、地方利益原则依旧存在的状态下,资源流动的交易成本也很高,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交易还要受到阻碍。因此,通过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因是十分有限的。

(三)质量型轨道的选择是我国经济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的必然结果。建国40多年来,我国经济平均以超过10%的速度发展,并建成了独立的、门类较全的工业体系。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是通过大量投入的数量增长的粗放式经营,属于速度型。这种粗放经营虽取得较大成就,但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问题:产业结构失衡、资源利用效率下降、产品质量低劣、经济效益较差。而且我们要看到,在组织、技术、管理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社会资源的投入产出率将呈下降趋势;并且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迟迟不能完成。这些已明显制约了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现有资源条件及其利用水平下,为适应结构优化和市场竞争,我国经济已刻不容缓地要求从粗放式的外延扩大再生产转向以提高单位产品的技术含量和企业管理水平为内容的集约式内涵扩大再生产,实现我国经济的战略转变。这种转变的实质就是通过提高国民经济的综合素质,使经济增长从速度型转

向质量型。

二、经济增长质量：内涵、度量标准及现状的实证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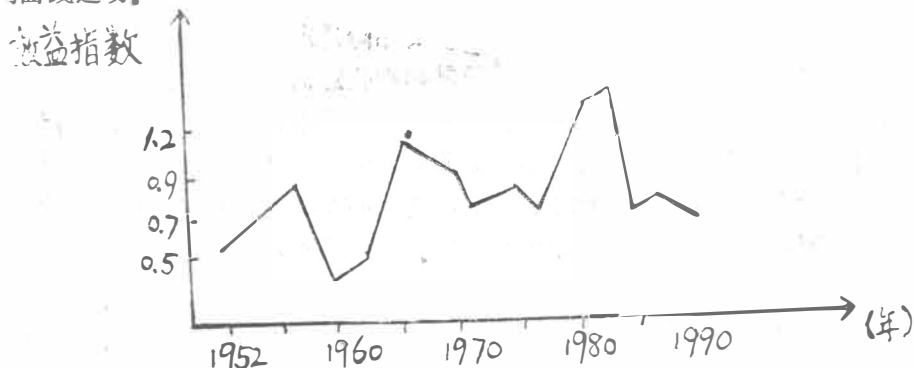
质量型经济增长模式，是对现实的社会再生产运动所作的理论抽象，是从质态上反映社会再生产运动的变化关系。它是在“适度增长率”条件下，通过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和消费资料的消费效果的提高，随着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改善而引起的一种经济增长关系。其中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主要表现为要素的宏观配置效率和微观的使用、产出效率。

经济质量的度量标准是评价一定经济增长过程及现象的主要标志，是理论适应于实践活动的尺度，这种尺度的内含是对社会经济利益和经济效益本质关系的集中反映。长期以来，我们对经济实绩的评价主要采用非结构性对比的总量指标，如工农业总产值、利税总额以及相应的增长速度等。这些反映经济数量绝对值变化关系的度量指标虽从总体上把握了经济的增长过程，但却不能说明经济综合体的结构关系、对比效益关系和产品质量关系，而后者正是衡量经济运行中社会生产力质量水平变化的主要标志。

(一) 现代经济要求社会资源合理配置，而资源最优配置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也是经济增长质量的反映。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从宏观结构上度量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重要内容，这种合理化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均衡化和高度化，即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耦合状态及其整体性功能对社会技术水平、生产能力以及人民生活的提高。我们用“产业结构综合效益指数”来反映产业部门的协调及其对社会经济效益的推进程度，说明产业结构的聚合质量水平，以此评价产业结构的整体效益状况。设：Y、K、L 分别代表总产值、资金总量和劳动者总人数； Y_i 、 K_i 、 L_i 表示第 i 个部门的产值、资金和劳动者人数； n 为部门总数； C 为产业结构综合效益指数，则得下列计算公式：^①

$$C = \frac{\sum_{i=1}^n \frac{Y_i^2}{K_i \cdot L_i}}{\sum_{i=1}^n Y_i} \cdot \frac{Y^2}{KL}$$

这项指标综合地反映产业部门变化的效益状况，如果 C 值上升，说明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上升，经济增长的结构质量水平较高；反之，则说明产业结构的聚合质量水平偏低。当然，我们也可以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数值分布状况来反映产业素质的协调程度，但综合性指标应该是在量的形式中表明效率水平的最本质的东西，并且是用来反映作为最终结果的、适用于进行比较的有严格数量规定的质量指标，从而显示社会最充分地利用劳动力资源和生产资源的能力。为此，我们按上述公式测算出我国“产业结构综合效益指数”呈下列曲线运动。



我国产业结构综合效益指数变化的全过程,综合地反映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质态水平,也体现了三次大的调整波动关系,即“一五”期间调整、1963~1965年的调整和1978~1981年的调整。每次调整虽使产业结构综合效益上升,但随即又产生了结构的不平衡、失衡乃至效益下降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1982年后,我国产值速度增长较快,但综合效益却没改观,甚至结构效益还是下降;1988年后,我国经济进入治理整顿时期,但产业结构综合效益仍呈徘徊局面,90年代的头两年也仍是较低的水平。产业结构整体效益的上述状况表明,我国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近年来出现下降之势,产业结构的聚合质量和协调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也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结构增长比较缓慢。

(二)社会生产效率是从经济增长的过程角度在量的结合关系上考察其质量水平的最重要标志。我们分析经济增长质量并不意味着同分析经济的数量关系相对立,而是在适度的量的规定下,特别是经济发展速度一定的前提下,研究社会生产因素与生产成果间变动的最优对比关系。我们用资金和劳动力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投入因素,以净产值、利税总额作为产出成果的净价值形态,则产出与投入关系的对比指标乃是反映社会效益和体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标准。

集中分析一下1978年改革以来的我国经济中的一些重要指标不难发现,当今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下降之势已相当严峻。据资料反映,我国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从1984年的24.2%下降到1990年的15.63%,而且是逐年下降;产值利税率从1984年的23.2%下降到1989年的17.27%,今年第一季度为14.07%;固定资产使用效率从1987年的每百元实现税利16.83元,下降到1989年的15.24元;劳动生产率1988年比1987年增长9.3%,而1989年比1988年只增长1.6%,1990年却比1989年又下降了约2%。与此同时,工业中成本投入和物质消耗却不断上升,而且在总产值中比重也逐年增高,即由1986年的65.4%上升到1989年72.1%;工业企业的亏损面由1984年的10.7%、1987年的14.1%扩大到1990年的16%。虽然在同期的经济运行中确实存在经济效益的分流和转移现象,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效益状况十分不尽人意乃是客观事实,并且成为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十分困惑的难题。

(三)消费效果和产品质量是我们比较忽视的内容,但它们却是从使用价值与价值统一的关系上度量经济质量的重要方面。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恩格斯指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②可以说,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价值的实现程度是使用价值或效用的函数,产品的效用关系甚至影响和决定社会生产的选择。因为“只有消费才使产品成为财富”^③,生产的经济效果只有在消费中才真正体现。由于粗放经营,我们一直比较注重产量指标,淡化质量指标,从而产生了现行体制下工业产品质量低劣的严重问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市场疲软状态中,由于质量水平而阻滞销售的约占40%,因产品质量而发生亏损的企业占总亏损面的46.2%,至于大量的次劣商品降价出售或堆积在仓库中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惊人。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对质量及其标准化意识的淡化,致使企业创新冲动很弱,新兴技术的产业化步伐相当缓慢,新产品的开发和覆盖率也很低,近90%的产品质量和性能只相当于国际50—70年代的水准,竞争基础脆弱,能力也衰退。质量差,效益低,既使企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发生困难,也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心理,造成不少拥有一定购买力的消费者持观望和等待态度,妨碍了有效需求的正常实现和市场回升。这些已成为当今经济建设中的一个十分尖锐的矛盾。

诚然,中国40年工业化建设起步时期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虽具有客观性和不可逆转性,

并取得了基本的成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发展模式本身固有的缺陷和问题的严重性已日益突出,尤其在10年改革开放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造成我国产业结构综合低效、社会生产效率下降和产品质量低劣状况所显示的社会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原因固然较多,但我们认为其根本乃是: 1. 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这既有宏观指导方针的失误,也有各地方追求地区利益和“经济政绩”的表现,使整个经济运行以速度、产值为中心,忽视企业基础工作、技术进步和管理的改进。在“短缺经济”卖方市场存在的条件下,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得到了体制的保护和依托,有很深的根基。2. 技术装备程度落后,管理水平低。现有企业虽引进不少先进技术但吸收和消化功能差,先进技术装备率只有20%左右,并且由于体制、市场和资金等原因,使技术改造和创新缺乏相应的动力和实力,产生了既有一部分资产超负荷运行、又有大批资产浪费闲置的双重现象。技术和管理质量的落后是制约我国经济的重要因素。3. 就业规模与就业质量的反差。社会生产力和作为生产力因素的劳动力都是不断演化和更替的。人口与就业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的最突出问题之一,由于面对较强的就业压力,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劳动投入量也较多,但我国劳动力素质普遍较差,在技术装备和资源供应的约束下,劳动生产率提高就缓慢,从而在要素投入质量上影响经济增长效益。退一步说,即使在粗放经营条件下能取得速度效益,但在质量水平较低的制约过程中,经济的高速度也是无法维持长久的,甚至会走向其反面——负增长,这在我国部分长期高速发展的地区已得到了证明。

三、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机制构造

实际上,从纵向的比较角度来看,我国经济在40多年的增长过程中其质量水平是逐步提高的,问题在于,这种提高的程度及其形成的社会生产力实绩水平与同期的经济发展速度、资源耗费和现实中人们对生活质量改善的客观要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而且我们一直没有从战略转变上来认识这种关系,致使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沉淀了一系列矛盾,这些矛盾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集中暴露出来,形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强大阻力。在这一阻力的作用下,当前我国经济面临较大困难,这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因此,为了振兴90年代经济,我们必须从战略转变的关系上构造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经济机制。

(一) 确立以质量为中心的战略导向。任何经济发展战略总是在一定的指导思想向下形成和强化的,经济战略的转换首先要求战略思想导向的转变。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实现从速度型到质量型的转变,首先必须在指导思想上确立以质量为中心,将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使用、产出效率和产品质量等作为经济增长的中心内容,并通过建立相应的结构效益指标、社会生产效率和消费效果指标来作为评价各级政府管理经济政绩和企业经营状况的主要标准,在经济的宏观指导方针和具体的政策目标上将经济效益作为中心地位来对待。同时,为克服长期以来粗放经营下速度型增长过程中轻效益的惯性心理复归所形成的“后拉力”,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以质量为中心的理论研究和舆论宣传,逐步消除那种急于求成和淡化经济增长质量的指导思想,确保战略导向的实效性转变。

(二) 依靠技术进步推进结构优化,提高经济质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来自于技术进步引起的对生产要素、生产条件、生产组织过程的重新组合而产生的更高效的新的生产体系。如前所述,速度型增长主要是通过要素投入的粗放经营,而质量型增长

则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技术创新的集约化经营。这种实现方式的根本区别决定了科学技术进步成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途径。1. 运用技术进步推进结构优化。产业结构间的联系实质上是在技术关联下表现的供求关系,产业结构间的变动主要是由各产业的技术水平变化引起的。目前我国产业技术层次比较低,高技术的产业化步伐缓慢,二元经济间的技术断层仍很明显,从而造成了产业结构不合理或不平衡状况很难一时调整到位,影响了经济质量的提高。为此,首先要在明确的产业技术政策的指导下,进行有目标、有重点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同时要根据各产业的技术特点进行技术创新,并通过创新的扩散机制来提高产业结构的质量层次,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从而增大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少等量收益的资源消耗。2. 通过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产品质量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方面,而现代产品性能的稳定与提高,产品精度及可靠性,都必须依靠生产的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才能办到,只有通过企业的技术改造,尤其是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使企业工艺技术水平有较大发展,并在技术革新的过程中才能取得真正的稳定提高的高质量和高效益。3. 加速科技成果的商业化过程。现在,我国科技研究成果水平并不低,个别项目在亚洲乃至世界也居领先地位,但科技研究成果的转化率较低,商业化过程缓慢,传导机制也存在不少障碍。因此,要在加快新产品的技术开发和工业产品升级换代的过程中,通过培育和完善技术市场,利用技术市场的辐射和传导功能来加速科研成果的生产化和商业化步伐,从而真正发挥科学技术的动力效应。

(三) 提高就业质量。经济活动是主体通过相对自由选择 and 决策来使其活动目的、方向、途径得以表现和实现的能动性动态过程。就业作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具体形态,实质便是通过人类劳动功能的外化和强化来促进生产力的成长。就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就业数量的增加和就业质量的提高,而从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中所共生出来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增加就业的矛盾表明:在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基本一定的条件下,就业质量状况便成为就业数量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约束前提。在我国,经济实践中所衍生的高就业、低效率的格局也已成为困扰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历史羁绊,而且90年代将会表现得更为明显。就业质量主要包括: 1. 适度就业规模下的就业结构优化,它主要表现为就业在产业部门、行业地区间的组合和比例,体现劳动力的配置效率。由于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不高,以及长期的就业刚性政策,致使工业和第三产业无法吸纳较多的就业,造成就业分布的产业失衡,劳动力配置效率很低。在经济发展走集约化质量型增长的过程中,虽然我们不能再靠大量的外延化劳力投入,但可以优化劳力组合,尤其是发展第三产业和小城镇工业,同时要改变就业政策,切实允许劳动力要素的流动。2. 劳动力素质。这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其中劳动力文化素质更为突出。目前全国的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16%,受过高等教育的只占1.25%,而实际创造财富的农业和工业部门中后者的比例更少,表现了明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知识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含量很有限,因此,提高劳动力素质在质量型增长中就显得十分迫切。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扩大各种形式的劳动力培训,增强实用知识的普及;另一方面要根据各产业、各部门特点,制定具体的就业质量指标,如学历、技能、经验等,从整个社会来强化对知识技术重要性的认识。3. 劳动者积极性。这是劳动力素质使用发挥效率的重要因素。目前各行业劳动积极性和企业动力不足是影响经济效益提高的基本原因之一。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就是提高劳动者的能动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里除了一定的物质刺激作用外,管理主体必须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来关心劳动者,并且在一定的制度(下转第35页)

(三) 提高经济效益与调动人的积极性问题。国有大中型企业劳动力过剩、人浮于事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据一些典型调查和分析,将目前企业的职工裁减25%,甚至更多一些,也不会影响生产任务的完成。由于企业冗员过多,使单位产品成本中工资的含量过高,影响企业效益的提高。同时,由于冗员过多,且难于推行劳动力的优化组合,企业的分配制度也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劳动生产率有持续下降趋势。据有关资料反映,上海企业的价值形式反映的劳动生产率是下降趋势,以实物形式反映的劳动生产率也呈下降趋势。此外,由于政策倾斜,“三资”企业职工和其他经济成分的职工(包括个体户)的收入明显高于国有大中型企业职工的收入,导致后者经济地位的下降,其结果极大地影响了国有大中型企业职工的情绪和生产积极性。因此,职工出勤不出力,下班寻找第二职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应当说,国有大中型企业效益滑坡与其相关甚密。为此,必须在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推动企业要素(包括劳动力)的优化重组,并适时推进就业市场取向的改革和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需要指出的是,在增强企业活力的进程中,上述难点是绕不开的,只有深化改革,重塑企业微观基础,国有大中型企业才能有真正的活力。在完善公有制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原则下,重塑企业微观基础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在保证公有制的前提下,致力于解决中央、地方政府及企业对产权份额的边界,在所有权份额明确化的基础上开放产权在企业之间的转让市场,建立国家垄断所有权、企业竞争经营使用权的国有资产经营机制。第二,分层次适当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松动非国有企业进入某些适宜于充分竞争的产业部门的限制壁垒,将政策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倾斜,以逐步形成垄断竞争型的不同所有制企业兼融的格局。第三,组建多种类型、不同规模(国家级、地方级)的企业集团,按照国际惯例组织生产经营活动,使企业的生产要素不断得到合理的配置与使用。简言之,只有让国有大中型企业恢复其本来的面目,成为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真正的企业,才能使它们具有内在的活力,这是企业改革与发展实践已经阐明的一个基本点。

(上接第14页) 程序下维护和增强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同时必须敢于承认失业的公开化,通过建立一定的失业制度从外部竞争压力上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使人力资本效率得到切实发挥。

(四) 改进管理,创造相应的体制和政策环境。高度集中式的计划管理体制是“速度型”经济增长的制度保证,而经过10多年改革之后,旧体制的运行方式已基本打破,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正开始形成,这就要求我们继续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将管理的内容从总量速度扩张转向效益质量改善,敢于发挥市场的功能。宏观上,政府应主要制定“适度经济增长率”和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以阻止低效高速增长的回归和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更为重要的是宏观政策和管理思想要保证其稳定性,减少政策波动的冲击。企业管理要以质量为中心,包括劳动、物资、成本、产品等管理都要以降低消耗、追求效益为原则,通过规模效益和品种质量创新来提高我国的经济实绩水平,从而真正走出一条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内容、以集约化经营为方式的经济增长质量型轨道。

① 参阅张寿:《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变化》,中国计划出版社1988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5页。

③ 《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312页。